

新中国外交战略决策的确立

□ 张 丽 王红续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夺取全国政权指日可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加紧制定夺取全国政权、创建新中国内政方针的同时，还从处理沈阳等大城市接收过程中出现的外事纠纷开始，把外交战略问题提上决策日程，从而确定充分体现独立自主精神的新型外交方略，彻底恢复和巩固中国的独立与主权。

一月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不承认”政策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接近尾声，陈云带领接收班子进入沈阳。因为接管工作时间紧迫，军管会来不及设立单独的外事机构，而由市长负责外事工作。由于缺乏外交经验，在处理美英领事馆电台等问题上面临被动局面。

陈云把这种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并请示外交应对方针。周恩来于11月1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东北局电：我们对他们现在的领事应采取不承认，而只承认其为普通侨民的方针，领事馆的电台原则上必须由军管会封存代管。

1948年11月28日，陈云向东北局并转中央提交《接收沈阳的经验》报告，在总结接收工作的成功经验后，还检讨了接收工作的不足之处。沈阳接收中出现的外事问题，促使毛泽东和周恩来把外交战略的讨论制定，提上政治局和中央全会的重要议程。

在1949年1月6日至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周恩来此前提出的“不承认”立场加以肯定，并把这种“不承认”的外交政策形象地称为“另起炉灶”。为更好地实施这一外交战略方针，1月19日，由周恩来起草并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下发全党。这一外交指示既阐述了“另起炉灶”的外交原则，又规定了如何处理外交关系、外资关系、对外贸易关系、海关税收、外国传教士以及其他外国经济文化机构及外国人入境等具体政策。还专门谈到如何设立外事组织问题，其中规定，目前在哈尔滨、沈阳、北平、天津、济南5个市的市政府内应成立外国侨民事务处及公安局内设外国侨民管理科。

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定的“另起炉灶”外交战略方针，包括1月中旬制定下发的具体外交政策文件，为妥善处理夺取天津、北平等大城市后带来的复杂外事问题，提供了行动准则和操作方法。天津于1949年1月15日解放后，在军管会内当即设立了外侨事务处。两天后黄华和章文晋奉中央命令离开西柏坡赶赴天津市，任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和副处长。外事处依照政治局会议的“不承认”外交方针和即将下达的中央外交工作指示精神，处理各种涉外事务。

与米高扬会谈时提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

毛泽东对中美关系极其重视，但他与斯大林之间却存在一些分歧。为了加深相互了解，让斯大林全面掌握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和中共内外政策，从1947年初开始，毛泽东曾经数次准备秘密访问苏联，特别是1948年4月致电斯大林要求访苏，准备与斯大林讨论中国革命、建立新中国和中美关系等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国战局发展离不开毛泽东，加上安全考虑，就没有同意毛泽东访苏的请求。但在1949年1月，他委托米高扬来华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和中共内政外交政策。

1949年1月31日午后，毛泽东在西柏坡家门口迎接斯大林派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刚见面，米高扬就表示，他是受斯大林的委托来听取毛泽东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汇报。从2月1日至3日，毛泽东同米高扬正式会谈。在谈话中，毛泽东主要了解解放战争的情况以及新中国内政方针的设想，同时也向苏联客人谈了外交方针政策。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毛泽东在同米高扬的谈话中，提出

了新中国要采取的一项重要外交战略方针，即“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旨在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以便为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为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利合作关系铺平道路。

关于斯大林最担心的美国会不会对解放战争进行直接军事干预的问题，毛泽东说，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把军用物资大量供应将军。总之，国际形势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很有利。

1949年2月6日中午，毛泽东到米高扬住处为他送行。米高扬对担任翻译的师哲说，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米高扬与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深入会谈，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斯大林消除对毛泽东的思想隔阂，开始积极地支持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确定“一边倒”外交战略

按照一月政治局会议的要求，从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主报告和总结讲话。

在3月5日所作报告的第七部分，毛泽东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新中国外交的下列大政方针。第一，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获得真正独立的前提，就是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控制权。第二，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第三，现在乃至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不应急于去解决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同时，新中国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对于前期提出的“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两大外交方针更加深刻而清晰的阐述。

在3月13日的总结讲话中，毛泽东

专门说明了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特别是中苏关系问题。在报告中，他提到了“两大阵线”问题，即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线和以社会主义苏联为首的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他指出，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反帝国主义性质，就使得帝国主义者极为仇视这个革命，竭尽全力地帮助国民党，这就激起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愤怒，并使帝国主义者丧失了自己在中国人民中的最后一点威信。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新中国外交的一项最重要的战略抉择：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关系。可见，在美苏两极对峙的国际冷战格局下，毛泽东开始确立新中国的战略定位，实际上就是不久后宣布的“一边倒”外交战略。

毛泽东和周恩来恪守外交战略原则的坚定性，但又保持外交策略上的灵活性。这种外交策略的灵活性，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及其新政权并不断绝与美国的官方联系。1949年4月中旬，周恩来在北平接见黄华时说：过几天南京就要解放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你还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要特别注意了解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态度。

南京解放后，黄华奉周恩来之命出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从5月中旬至7月下旬，黄华同司徒雷登进行了多次会晤，6月28日还向司徒雷登转达周恩来的指示，同意他去北平并与当局会晤。司徒雷登表示极为高兴，决定将此事报告美国国务卿。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重视中苏关系，把它放到新中国对外关系的首位，对美国并不抱幻想。在美国决策者向司徒雷登发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的指示前后，毛泽东于1949年6月底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向世界公开宣布：新中国将实行“一边倒”外交战略。



“一辈子做好事”的革命老战士吴玉章

□ 孙春胜



吴玉章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语言学家，是“延安五老”之一。在其漫长的一生中，亲身经历了清王朝的颓败、西方列强的入侵、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直到新中国的成立，为之奉献了毕生的精力。毛泽东曾称他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的最先进、最觉悟的老战士。

潮立时代的革命先驱

吴玉章一直胸怀报国志，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去追寻、探索救国之路，从不放弃。吴玉章于1905年在东京与孙中山相遇，参与筹划组建中国同盟会以来，经历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反对袁世凯走封建帝制道路的第二大革命。吴玉章对资产阶级的屡次失败进行了反思与总结，在众多救国道路中，通过对救国方案的比

较，坚定地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从资产阶级革命家转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不渝的沿着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前进。

吴玉章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运动中大显身手，促使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被转移到苏联。由于长期的奔波劳累，吴玉章病倒了，在黑克里木半岛进行修养。在修养期间，也不忘革命工作，与叶挺一起探讨武昌起义失败的原因，并形成《八一革命》详细报告。吴玉章还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革命实际，担任赴苏联学习的党员中国历史和革命的课程讲解教员，并发表了众多具有鲜明观点的历史著作。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吴玉章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在西方国家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回国后，他一直奋战在抗日宣传的前线，参与群众集会，呼吁全民族起来反抗侵华行动。

促进语言发展的文字改革者

吴玉章自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一直致力于从汉语拼音、汉字简化、普通话推广三个方面推行中国文字改革。吴玉章于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与瞿秋白、林伯渠等进行汉语拉丁化字母方案的制定，这项方案于1933年介绍回国，并且在全国范围进行了新文字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吴玉章通过办培训班向解放区的农民和子弟兵进行拉丁化新文字推广活动，鼓励群众使用新文字写信、记笔记，目的在于消除文盲。

新中国成立前夕，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了为了有效地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复。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积极推行文字改革，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56年国务院通过并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问世，1964年《简化字总表》编印发行，大大促进了普通话和简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吴玉章除了在理论层面进行文字改革的总结，更加身体力行地在实践方面进行调研与推行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80岁高龄的吴玉章视察了10多个省市，深入农村与工厂家舍，与田间地头正在平整土地的农民、车间的工人进行交流沟通，收集汉语拼音以及普通话的使用情况，致力于语言文字的改革与使用，促进了现代语言文字的大步发展。

实事求是的革命教育家

新文化运动爆发后，吴玉章意识到革命必须要与社会实际工作相结合的重要性。通过国外的留学经历，他发现教育制度的建立发展对西方国家先进思想的影响，总结出必须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检验并总结出理论，只有这样才能够救国救民，最终赢得革命的胜利。自此，吴玉章将毕生精力放在探索有益于人民群众的教育途径，并在不同时期进行办学实践，从而形成适合中国实际的办学理念。

辛亥革命失败后，吴玉章在被迫流亡法国期间与蔡元培等建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在1912年回国后，吴玉章继续在多个省份建立

“留法勤工俭学会”分会，帮助更多地留学法国的学生克服困难，学有所成，从而更好地回国报效祖国。通过一次次的实践，吴玉章更加注重学生对于经世致用学问的学习，希望学生将西方国家先进思想运用于祖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束缚。出于打造一支专业素质过硬的师资队伍的重要性认识，吴玉章在应邀担任成都高师校长期间，总结出了严于律己的校风校纪和因材施教的办学理念，并且根据当时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调整学科内容，更新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创新能力。

抗日战争时期，吴玉章担任延安大学校长。他根据抗战要求，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带领延安大学为革命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革命干部。在教学过程中，他要求教员根据学生文化程度和服务对象的不同，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培养学生坚定的革命立场。在解放战争时期，吴玉章担任华北大学校长。他从实际出发，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努力把学生培养成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型干部。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满足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大量需求，吴玉章创立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在此期间，吴玉章更加注重专业人才素质培养、政治理论教育，尤其是在工农干部培养方面，让其专业素质与政治觉悟相结合，更好地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各类优秀人才。



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提出，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基层见到实效。这一重要部署，把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要求进一步引向了深入，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基层向纵深发展的动员令。落实好这一部署，关键要在“见到实效”上下功夫。

夯实政治建设统领地位，在坚定政治方向上见到实效。基层党组织在党的组织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党的领导能否贯彻落实到位、党的建设能否落到实处，基层党组织的作用至关重要。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重大战略部署能否在基层落地，关键在于基层党组织的“四个意识”强不强，政治功能突出不突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明不严明。如果基层党组织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上打折扣，就会造成全面从严治党“中梗阻”。因此，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基层见到实效，必须要推动基层党组织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坚持政治方向的坚定性和执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的自觉性。为此，基层党组织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站在落实“两个维护”的高度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突出政治功能，贯彻落实《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保不越红线、坚守底线。

完善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在落实责任上见到实效。党的十八大以来经验表明，落实责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当前，党委抓、书记抓、各有关部门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已经建立，并在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实践中仍存在诸如责任意识不强、责任主体不明、责任内容不清、责任追究不力等问题，从而制约了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的全面落实。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对各责任主体的责任意识教育；要科学界定不同责任主体的基层党建工作责任，重点区分并明确主体责任、第一责任、分管责任、直接责任；要建立责任清单制度，细化不同领域、不同层级、不同岗位、不同机构的责任内容；要认真开展基层党建工作责任考核评价，把基层党建工作考准考实；要严格基层党建工作责任追究，以严肃的问责推动责任的落实。

树立质量导向，在工作内容上见到实效。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是党的十九大顺应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提出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任务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与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要求相比仍旧有不少差距。比如，有些地方和部门虽然明确了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但是主体责任压力在向基层传导时存在层层递减现象；有的上级党组织加强了对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和监督，但又催生了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文山会海”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新表现；有的基层党组织虽然建立了落实党的组织生活的各项规范，但是党组织生活的效果不佳；还有的基层党组织强调“痕迹管理”，但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这些问题表明：基层的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不能止步于既有成绩和成效，而必须牢固树立质量导向，确立质量标准，实施质量管理、质量评估、质量考核，把高质量的要求贯穿到基层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任务中去，全面提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在基层见到实效

□ 张 超

升基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任务的工作水平和实际效果。

强化监督，在解决基层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上见到实效。基层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危害不可小觑，它们啃食着群众的获得感，侵蚀着党的执政基础。当前要密切关注“四风”在基层的隐形变异问题，聚焦扶贫、民生领域的腐败和黑恶势力“保护伞”等痛点焦点难点问题，坚决向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亮剑，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做深做实做细市县巡察和纪委监委日常监督，按照《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的规定，把村、社区党支部工作纳入县级党委巡察监督工作内容。要深入推进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以作风攻坚促进脱贫攻坚。要开展民生领域专项整治，聚焦教育、医疗、低保、住房、养老等惠民领域，重点整治吃拿卡要、盘剥克扣、私分滥发、挥霍浪费、受贿行贿等问题。要严查基层干部违纪违法行为，严查黑恶势力“保护伞”，严查“村霸”、宗族恶势力和黄赌毒背后的腐败行为。

激发基层干部积极性，在激励干部干事创业上见到实效。“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广大基层干部是党在基层的执政骨干，他们任务重、压力大、待遇低、出路窄。对基层干部的管理，必须把从严管理和热情关心结合起来，既要体现组织的力度，又要体现组织的温度。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因地制宜制定实施细则和配套办法，为激励基层干部担当作为提供制度保障。党组织要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基层干部撑腰鼓劲，组织敢于担当，干部才会有底气。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要保障广大基层干部的合理待遇，主动帮他们排忧解难，为他们创造良好工作和成长条件。要进一步减轻基层负担，让广大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用在抓工作落实上来。

